

译者前言

本书著者卡尔·奥特马·冯·阿雷廷（Karl Otmar von Aretin）是德国历史学家，出生于 1923 年。1952 年获博士学位。1952~1957 年在《新德意志人物传记》杂志社工作。1958~1964 年在哥廷根马克斯——普兰克历史研究所任助教。1964~1988 年任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近代史教授，1968 年至 1994 年担任美因兹欧洲历史研究所世界通史部主任并自 1987 年起一直是《新德意志人物传记》的主要作者。现在，冯·阿雷廷教授仍然是奥地利科学院的通信成员及匈牙利科学院的名誉成员。主要著作有：《神圣罗马帝国，1776~1806 年》（二卷，1967 年）；《教皇制度与当代世界》（1965 年，1974 年第二版）；《巴伐利亚通向近代之路》（1976 年）；《帝国，和平秩序与欧洲均势，1648~1806 年》（1986 年，1992 年第二版）等。

本书发表于 1980 年，1993 年再版时，作者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对个别内容进行了修改。

本书内容主要是围绕着 1763 年至 1820 年间德国社会上的两次改革高潮展开。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十八世纪下半期德国为建设成为欧洲强国而进行的改革，其中分别叙述了普鲁士、奥地利及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小邦国的改革目的、途径、特征及结果；第二部分研究拿破仑统治时德意志地区与欧洲国家间的国际关系、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德国局势以及德国革命诸问题；第三部分系统论述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各邦国的改革，着重论述了普

鲁士改革、奥地利改革及两者间的异同；第四部分介绍德意志联邦形成的过程及各邦的立宪运动。著者试图通过德国在十八世纪下叶及十九世纪初的两次改革高潮阐明德意志帝国何以发展成德意志联邦，尤其是对其中的历史必然性、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德意志各邦国改革过程的异同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论述。对长期以来被史学界忽略的除奥普以外的德国其他邦国的历史，作者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本书对研究德国近代史上的改革运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洛史奈德意志史》第七卷。

导 言

1763年至1820年是德国历史上深刻变革的时期。1763年决定了德国此后的历史要由两个德意志的大国来左右。皇帝的权力自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以来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763年以后，更没有力量与众多的，联合在帝国议会中的帝国等级相对峙。除了普鲁士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强国，它不仅在帝国内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与皇帝相勾结，并利用皇帝成为欧洲列强中之一强国，这就是奥地利。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规定，帝国等级只是在不反对帝国和皇帝的前提下才能与外强结盟，但是，1756年，腓特烈二世反对皇帝的剥夺法律保护令，由此证明了这个规定没有什么约束力。普鲁士没有脱离帝国，但它的没有约束的行为根本就没有把帝国宪法秩序放在眼中，就此而言，它已经属于拥有主权的欧洲强国之列。

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矛盾、两者只满足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漠视帝国存亡的态度以及持久的以不适宜的方式进行的革命战争等等，这一切使帝国于1806年终结了。拿破仑坐上了原来的皇帝宝座，他现在是德意志中小邦国的庇护者和保护人。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是小诸侯、伯爵、帝国骑士和帝国城市，特别是那些天主教帝国贵族，他们的政治支柱是教会诸侯。总之，受害者就是皇帝直到最后都赖以实行统治的社会力量。原来的那种划分成皇帝、选帝侯、公爵、侯爵、领主爵士、伯爵和骑士的等级帝国在1806年被一个成员国相互平等的联邦所取代。这种局

面即使在 1814 年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帝国的内部联结状况就象其在 1648 年出现时以及在以后几年中固定下来的情况一样，在 1815 年又变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各成员国之间很少有共同性。德意志联邦制度的钟声奏响了。

1806 年，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都开始了社会改革，这使以前的帝国区域在拿破仑统治下上升为几乎与奥普相等的地位。虽然改革仍然是沿着开明专制主义的路线发展，但在改革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具有理性观念的政府官员，而不是专制君主。开明专制主义已发展成为官僚专制主义。在开明专制时期出现的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倾向，和为什么开明专制制度的国家在与法国大革命的较量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的问题，决定了德意志的改革。不仅莱茵联邦各国，而且普鲁士都致力一种君主立宪制度，1814 年法国宪法为此树立了榜样，1819 年以前的几年中亚历山大沙皇是君主立宪的先驱。然而，在德国，只有南部的几个邦国实现了君主立宪的理想。在这里，平等的原则不允许再建立等级代表的机构。

我们在这里所要着重描述的立宪运动对绝大多数德国人都产生了影响。那时，大约有 60% 的德国臣民移换了君主。一个天主教占绝对优势的帝国已成为一个新教占主导地位的联邦。

这种变化当然也在其他领域里留下了痕迹。提奥多尔·豪斯 1949 年在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引用 1801 年席勒的诗句说：

“在战争的烈燃中，
德意志帝国倒下了，
但德意志的伟大永存！”

席勒所说的“德意志的伟大”是指德国的文化。他在 1801 年所说的德国分为政治的德国和文化的德国，深刻地表现了德国政治衰弱和文化繁荣的情况。尽管当时德国政治瞬变、经济贫困、战争连绵、人心惶惶，但它却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时期。

在这以前，德国的诗歌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尚处于落后状态，现在，经过狂飚突进，经过了几乎成为德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阶段，诗歌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令人激奋的现象之一。魏玛成了一个诗人的荟萃地，它使这个小小的德意志邦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在和平的时期，文学创作会集在这里，经受了革命战争的爆发，在北德中立时期及 1806 年以前的停战时期繁荣起来，在耶拿和奥厄斯泰特灾难中毫无损伤地生存下来。如果仅仅从文学成就的角度进行观察，就不能相信德国的古典主义时代正是德国的社会变革、政治混乱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时代，维也纳的古典音乐由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推向了巅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维也纳城多次击败土耳其人的进攻，也曾两度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赤字动摇了贵族帝国的根基。

十八世纪末，维也纳的音乐达到了顶峰。在曼海姆、美因兹、斯图加特、慕尼黑以及许许多多南德邦国的教俗宫邸，演奏和作曲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一位很小的领主——奥廷根—瓦勒斯坦的克拉夫特·爱恩斯特，甚至以音乐才能来聘用厨师、马厩清扫工及佣人，并组织起一个管弦乐队。约瑟夫·海顿曾为这个乐队指挥并作曲；莫扎特年轻时也曾在此谋职。在 1795 年到 1805 年间的混乱中，南德的这种音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毁灭了，因为革命战争主要是蹂躏天主教地区。然而，更直接的、可与政治事件相提并论的破坏行为不是在文学领域，也不是在音乐方面，而是在美学领域里发生在 1788~1800 年间的激进行为。在短短的几年内，洛克克艺术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爱皮昂式的线条。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这样的过激现象：艺术家们在几年中没有生活保障。例如定居在巴伐里亚的兰德胡特的约翰家族，这个在整个下巴伐里亚劳作的艺术家族，在十八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份定货单。其中影响最大的克里斯提安·约翰在八十年代末还因

为定货单太多无法应付，而在 1804 年则贫困而死。1803 年的巴洛克教堂统统被看成是丑陋不堪的东西。这种破坏行动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在绘画领域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推倒了。在法兰克福，达尔贝格统治时铲平了防御工事和城墙，在城市中心建造起花园。从此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景表现法。慕尼黑的底里斯、瓦根保尔和科伯尔；维也纳的约瑟夫·安冬·科赫；德累斯顿年轻的卡斯帕尔·大卫·腓特烈以及他们的朋友用他们的自然风景画使城市景物画、柔和水彩画及长期遭受毁谤的其他画法获得了一种新生活感受的表现力。旧式的、以城墙来卫护的城市解体了；巴洛克式的古典神祇不再是画面的装饰，当代的人物才是人们欣赏的对象。如果我们说这些图画也是源自鲍辛及克劳德·罗尔莱的古典——理性主义绘画风格，那么我们还要加上一句十九世纪初的绘画流向：几乎是以地形学的方式重现此时此代。人们不再以理性的方式描绘自然物景，而是真实地表现其原本面目。

思想史领域内的革新观念更明确。十八世纪末的国家法学理论在德国与在法国和意大利不同，它没有对于国家的职能及形式等问题进行一种广泛的、以启蒙思想为指导的讨论。腓特烈·卡尔·冯·莫泽、卡尔·腓特烈·海伯林、斯皮特勒、普特，是的，甚至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史洛策尔本人直到最后都还坚持帝国这种国家形体。十八世纪末，维兰德考察了祖国的现状，之后他骄傲地说：“史无前例的帝国秩序尽管有其不可否认的弊端和缺陷，但是，与法国的民主体制比较起来，它更有益于社会，它的形体更适应于它所处的文化阶段。”这种传统的国家形体却在 1806 年提前结束了。

在这一时代，还出现了以艾曼努尔·康德为首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代表人有费希特、谢林及早期黑格尔，除了启蒙思想以

外，理性哲学是改革思想的又一推动力。康德的国家理想促进了人民代表立宪国体的形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他看到了渴望已久的理性时代的曙光。费希特和黑格尔与他同时创造了义务这一概念。这种高尚的义务观念鼓舞了广大的公职人员去制定并实现改革的方案，特别是在普鲁士，献身于国家的牺牲精神就是一种推动力量。在我们所叙述的时代以前，浪漫主义还是一种逆流。谢林成为哲学的代言人之一。腓特烈·卡尔·冯·萨维格努，这位历史法学校的创始人，先是于 1808~1810 年在兰德胡特大学以后又在柏林大学以其历史自然法权的理论反对改革者的“人赋于权”的思想。他为传统保守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支柱。他们认为，非历史传统的、纯理性的启蒙改革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一灾难的根本原因。这也是 1815 年以后出现的反对改革的逆流的理论基础。

上述这一切，都曾经被无数次地论述并描绘过。本书老调重弹，意在综合叙述这一时代的思想史和政治史。最近的研究开始转向另外的角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开始有人重视那段长期被忽略了了的帝国史，尤其是帝国最后几年的历史。因此，两个德意志强国的崛起及其发展史的意义已得到肯定。奥地利与普鲁士只是在帝国的范围内进行角逐。这就表明，尽管这两个大国要独立自主，但仍然没有逃出帝国的恶运。由此，对莱茵联邦国家也有了新的评价。哈·伯尔丁和爱·费伦巴赫的研究对此有开拓性的意义。同样对德意志联邦也有了新的看法。对于帝国、莱茵联邦和德意志联邦的观察有不同的标准。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一个“第三德国”受到注目，看起来，从这个角度，从直到现在还不被人重视的法权发展的角度来叙述那同时也是立宪社会变革的年代，是很有意义的事。在德国历史的长河中，帝国的传统、莱茵联邦的经历及德意志联邦的历史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可是长期以来，它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编纂史学所摒弃。当然我们在此不是重新评价德国的历史，而是叙述人们长期忽略的一段

历史过程。由德意志帝国向德意志联邦转变的这段历史正好在德国立宪角度上是统一的历史。所以，我们在此将着重叙述这些问题。

第二版序

从第一版到现在这本书已面世十二年了。在这十二年当中，长期被忽略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史、莱茵联邦史、德意志联邦史以及参与联邦的德意志邦国的国家形式等问题都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在没有改变对德国统治秩序变革和邦国格局变化的叙述的前提下，上述研究也基本包括进本版之中。许多在这个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中酝酿产生的社会变革都提到并进行了相关的叙述。在德国历史上，社会生活在政治的压力下发生持久变化的时期并不多，在此帝国的灭亡以及由此相伴而来的教会邦国的还俗运动和大多数帝国城市、小诸侯领地、自由帝国伯爵以及帝国骑士的脱离帝国的政治行为，成为社会生活在各个领域内发生变革的前提。

另一方面，在这十二年当中对革命运动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时代的变革深受党派的作用和影响。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没有超出一种对普通动荡的叙述范围，在那个深刻变革的时代这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史及其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在第一版中是叙述的主题，在第二版中仍然如此。

参考书目增加了很多，这是考虑到对这个时代越来越大的研究兴趣。与这一套丛书的其他卷本不同，本书对这些参考书目又进行了重新的排列补充，以便于研究者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部分

从胡伯图斯堡和约到革命战争

1. 德国及欧洲政治（1763~1792）

1763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内部政治改革的时期。英、法两国主要是在殖民地所进行的七年战争，不仅将两个德意志强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也使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世界大国本身精疲力尽。尽管这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已根深蒂固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但1763年以后，新的战争不易诱发了。即使是在1776年法国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英国人的自由战争时，双方政府都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

战争前夕，改革成了所有国家的当务之急。显而易见，日益增强的国家权能及战争赔款都不能解决开辟新财源的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阐述的改革方案首先在普鲁士得到了实践。普鲁士的崛起及这个比较贫穷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能量使遵循启蒙思想进行的改革成为众目所向。在柏林和彼德堡，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领导着一场普遍的改革运动。欧洲只有个别几个国家没有进行这种改革。一时间，好象在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六及其宠臣图尔高统治下的法国成为这一运动的前率。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1776年5月12日图尔高的被撤职，使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尽管开明专制将启蒙运动的核心地巴黎作为其思想中心，但法国的官方政策却没有受改革的触及。在巴黎形成的理论，在法国其他地方很快地超出了该理论自身，发展成为革命的理想，致使欧洲不同的国家制定了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案。这不仅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而且还因为它有欧洲专制主义后期阶段的特征，就是说，这种改革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利益及才干。

在众多的欧洲统治者当中，两个德意志强国的君主——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具有非凡的才干，他们确信自己的国家只有通过根本的全面的改革才能彻底改变面貌。

在十八世纪，两个德意志强国能够与霸权同盟相抗衡。1740年，奥地利击退了法国与普鲁士的进犯；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也曾宣布与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的联合军队作战。胡伯图斯堡和约决定了在德国国内有两个强国的存在，但问题是，这两个大国除了相互竞争以外，还能在什么程度上在欧洲政治中起独立的作用。就其地位级别来说，两个德意志强国的成功主要在于它们所实行的内部改革，通过改革它们一跃成为欧洲的现代强国，并且证实了通过合理的国家建设，国家权势会上升到什么样的高度。直到二十五年以后，当法国在大革命中经历了一个相似的权力上升的过程后，人们才知道，两个德意志强国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1756年两个天主教大国奥地利和法国的联盟在名义上一直存在到1789年，这也影响到帝国。直到此时，仍与奥地利保持联合的英国——汉诺威却完全站在新教派一边，致使在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出现了两个尖锐对立的教派信仰阵营。腓特烈与约瑟夫二世于1770年在奈瑟和特兰西瓦尼亚新城会晤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暂时联合的结果，只是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双方并没有从此和解。

1763年以后几年中的帝国政治形势仍然以奥——普竞争为

特征。此外，还有法国与普鲁士之间为防奥地利的扩张而进行的秘密合作。这种合作保证了十八世纪下半期的欧洲和平。

胡伯图斯堡和约以后，奥普之争在欧洲政治中还只是起一种附属性的作用，在七年战争中，也只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英、法角逐的次要战场。西里西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欧洲强国。然而，七十年代末期出现的下述两种情况，却促使奥普之间发生了新的战争纠纷：一种是腓特烈担心他死后普鲁士的生存问题；另一种是两个法兰肯边地伯国，即巴伐利亚及普法尔茨的继承问题。维特尔巴赫家族的两位选侯以及昂斯巴赫和拜伊洛特的边地侯都无子嗣作为继承人，普鲁士不仅要求曾属于霍亨索伦家族旁系的法兰肯边区，而且要求普法尔茨的一部分——于里希—贝格；而奥地利也要求巴伐利亚的一部分继承权。在这种情况下，十八世纪初出现的那种以巴伐利亚交换奥属尼德兰的意见重新成为议题。

身为欧洲列强之一的法国深深地卷进德国事务之中。法国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施的保证国，因此也是帝国秩序的保证国。它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对帝国社会施加影响。帝国西部有相当一部分德国诸侯从法国获得钱财，例如茨维布吕克公爵，正因为有法国的资助，他才能够沉湎于建筑的嗜好；再如许多小邦国的君臣都是在法国金钱的支撑下免遭破灭。1793年~1789年曾担任奥地利首相的图谷特也不鄙视这种发财的渠道，在八十年代曾为了法国金钱而为巴黎侦讯奥地利的密谋。因此看来，法国究竟对德国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很难估计。为了搞清楚奥地利是否最有理由对巴伐利亚提出继承要求的问题，法国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将阿尔萨斯的史学家杜·布阿特和普菲尔派往慕尼黑档案馆，其中杜·布阿特是1759年建立的巴伐利亚学术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由上可知，对德意志及其两个强国有影响的欧洲问题是比较少的，恰恰相反，奥普之争则成了欧洲列强不能忽略的火山口。

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即遗产继承问题和腓特烈所担忧的他

死后普鲁士命运的问题具有欧洲意义。在两个德意志强国的关系中，明显的权势变动会影响到欧洲的政治，所以，不仅普鲁士在腓特烈死后的命运问题，而且日益紧迫的继承问题都属于欧洲政治的范围。普鲁士的存留问题不足以促使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冒战争的风险，这个问题只能由其自身进行解决，对普鲁士来说，和平地增加战利品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普鲁士内部存在的那种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土地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缓和。欧洲的均势秩序对于和平扩张的对象只是个货源的问题。帝国所属的众多小邦国以及危机重重的波兰为这种和平扩张提供了大量的货源。

和平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兰。很久以来，腓特烈就看准了那个曾属于骑士团国家的西普鲁士。腓特烈的那位才华横溢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促成了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卡塔琳娜的合作，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共同扩张也诱发了奥地利的贪欲。于是，经过了长期谈判之后，终于于 1772 年 8 月 5 日第一次瓜分了波兰。普鲁士得到了除托伦和但泽以外的爱尔姆兰地区和西普鲁士地区；奥地利得到了加利曾及包括伦贝格在内的罗多梅里亚；俄国得到了里佛兰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对普鲁士来说，这些土地的获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向东普鲁士延伸的桥梁由此而建立起来。

这次瓜分使波兰失去了大约 30% 的国土，在欧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只有教皇。法国和英国的公众舆论中出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尽管如此，该国政府仍保持中立。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祝贺这一事件的发生，将它看作是理性对于那种尚处于中世纪状态，但其结局已经显露出来的国家制度的胜利。

显然，列强间近期内争议的问题近似解决。事实上，从此时开始直到 1806 年，甚至可以说到 1815 年，列强间瓜分德国——

波兰地区的意图都一直存在着。瓜分，就是说，如果东欧强国及其对手都满意于自己所获得的土地，那么它们就可以任意地牺牲其他小国的利益进行扩张。对于其他东部诸国的独立来说，这是最最危险的处理方法。

上面提到的巴伐利亚、普法尔茨以及昂斯巴赫—拜伊洛特的继承问题为这种投机活动打开了大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觊觎这份遗产。普鲁士自十八世纪初就开始努力想获得法兰肯的边地伯国。奥地利也将注意力投向巴伐利亚，或者用它来交换奥属尼德兰，或者以归还给帝国的领地的名义占为己有，以补偿在西里西亚的损失。于是，两个德意志强国进行了协商，为了使边地侯的土地与普鲁士联成一片，普鲁士同意奥地利在巴伐利亚获得土地。还有什么比这种协商更能使人理解呢？1778年1月，当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出现时，巴黎和彼德堡也期待着这种协商。海因里希亲王想像到了实现这种协商的可能性，1777年10月在给其兄腓特烈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你，我亲爱的兄弟，和皇帝统筹计议，那么你们将在其他什么人有可能抗拒这种巨大的一统的力量之前赢得德国。”但是1772年以后出现的新的奥普矛盾使这种协商没有成功。

1776年，两个维特尔巴赫的选帝侯一致同意宣布维特尔巴赫的全部领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家族领地财产，以免某一人去逝后其领土被收归为帝国领地。虽然如此，普法尔茨的卡尔·提奥多尔从一开始就热衷于用巴伐利亚交换奥属尼德兰，并于1777年瞒着他的巴伐利亚堂兄与奥地利谈判，12月31日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约瑟夫·马克斯三世突然死于天花，1月3日奥地利便迫使卡尔·提奥多尔签署了一份条约，规定奥地利可根据以前的几份继承条例得到斯特劳宾地区。对于这份条约的合法性，一直存有异议。它给腓特烈一个至少是使其对手在道义上失败的机会，在他看来，这种机会比获得土地更为重要。而且不能排除还有这样的

可能，即巧妙地将奥地利推向一个不得不承认普鲁士获得土地而自己一无所获的境地。因此，茨维布吕克公爵寻求腓特烈的支持，抗议其叔父割让斯特劳宾土地的行为就是一个很大的道义上的胜利。奥普之间原有的矛盾在 1778 年春重新被挑起，海因里希亲王重新扮演调解员的角色，在双方谈判中进行活动。然而，双方的相互信任没有达到足以做出必要的决议的程度。在谈判的背后，存有两个德意志强国瓜分帝国的危险：一方面腓特烈提出用昂斯巴赫交换萨克森的劳西岑，就是说，与此毫无关联的萨克森被卷了进来；另一方面卡尔·提奥多尔担心奥地利得到巴伐利亚，普鲁士得到于利希-贝格，奥普两国将以牺牲他的利益为前提联合一致。腓特烈找到了一个羞辱奥地利的机会，他认为这比双方在获得土地的基础上达到均衡更为重要。

在整个过程中，法国一直持观望态度。它只想避免由奥普引起新的欧洲战争。然而，当年 8 月中旬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准备宣布站在普鲁士一边参加战争时，新的欧洲大战已迫在眉睫了。自此开始，巴黎不遗余力地为和平调解而奔走，奥地利摆脱不了巴黎的影响，所以 1779 年 5 月 13 日在泰森签订了和约，这是一个由外国势力干预签订的条约。根据泰森和约奥地利得到了狭小的因河地区。普鲁士是真正的胜利者。和约规定，腓特烈·克里斯提安死后，昂斯巴赫一拜伊洛特归并普鲁士。

泰森和约中的第十二章规定，俄国为帝国秩序的保护国，一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法国和瑞典的保护国地位。这表明了德意志强国与欧洲其他强国的关系中的令人费思的软弱。在正常情况下，帝国秩序不需要由外部强力来维持。这种奇怪的保证制度将由俄国而继续存在下去，为外强干涉帝国事务大开方便之门。同时，这种制度在德意志强国左右德国局势的时代比以前更加巩固了。1803 年卢涅维勒和约以后，有关帝国领土改变的条约不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缔结，而在巴黎和彼德堡商讨，这种耻辱在泰森

和约中已经显现出来了。为了强调在帝国中的新地位，卡塔琳娜于 1779 年秋向法兰克福派遣了一位使臣，利用金钱这位使臣很快就成为德国消息最灵通的外国使节。

泰森和约以后，本来就不是很亲密的奥普关系瓦解了。两个德意志强国相互独立地各自从事自己的外交活动。双方的外交目的，在奥地利是如何获得巴伐利亚，在普鲁士就是在腓特烈死后如何维护其强国的地位。

当德意志两个强国相互勾结的危险卷进竞争着的欧洲联盟的漩涡中时，在八十年代，奥普之争又表现为一种对于欧洲和平的潜在威胁。新爆发的奥普间的战争很容易将英法之间的角逐引向欧洲大陆，在七年战争中就是这样。美国的独立战争（1776～1783）也很容易地成为战争的契机。

然而，伦敦和巴黎对此都不感兴趣。它们都对此保持沉默，并尽量避免为两个强国提供许诺。这种状况有利于在 1778 年就宣布站在普鲁士一边的俄国。在约瑟夫二世看来，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巴伐利亚，其主要原因在于俄国，所以他极力讨好女皇。富有魅力的年轻皇帝很快赢得了女皇的心。1781 年克里米亚的一次会晤中，奥俄避开普鲁士签订了一项盟约，卡塔琳娜答应帮助皇帝获得巴伐利亚，作为报答，奥地利参加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法国继续是奥地利的盟国，此次只在书面上更新了曾在 1756 年给腓特烈以致命打击的盟约。但很快就证明这不过是表面的东西而已，法国与俄国都没有真正准备帮助约瑟夫二世在战争的前夜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俄国驻帝国的使臣卢緬塞夫伯爵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在真正地 为巴伐利亚交换奥属尼德兰一事奔波，但是 1784 年 12 月他用一种很不明智的暗示告诉茨维布吕克公爵，在没有公爵同意的情况下交换已经成功了。于是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不满，认为这是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因此卡塔琳娜迅速撤回了由法国在背后控制的方案。公众的不满又给腓特烈一次机

会，他要使奥地利遭受更严重的道义上的失败。在他的被保护人茨维布吕克公爵的请求下，他在整个德国扬言说，皇帝要在俄国的帮助下以暴力迫使公爵交换土地。

来自于茨维布吕克的消息使腓特烈惊慌失措。他没有感觉到在欧洲政治及帝国政治中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直到 1783 年，他才从卡特琳娜与约瑟夫二世的联盟中醒悟过来。他多次寻求与巴黎结盟，但都失败了。腓特烈完全错误地断言，在他死后奥地利会与普鲁士做最后的决战。其实，俄国与法国都不想让普鲁士在腓特烈死后衰落下去。他们所担忧的只是盟约所承担的义务太容易招出另外一个敌对的同盟，倘若如此，那么普鲁士国王死后便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法国的外交大臣维格纳认为，作为同盟者比作为敌人更能钳制住约瑟夫二世，并且法国与奥地利联盟比给普鲁士做保证国更能激起腓特烈的愤怒。腓特烈想与法国联盟，或者法国宣布做普鲁士的保证国，然而，局势已十分险峻。他必须承认，他这位行将入木的人在国际交易中已不再是联盟的对象，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他死后承担责任。因此他开始接近那个到现在还受他鄙视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帝国。在 1779 年 3 月的泰森和谈中，他还自负地对其兄弟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帝国把我们当成与奥地利暴政相抗衡的有力的均势力量”，然而，在 1780~1781 年，他又表明在帝国内委派常驻使节可望而不可及。因为这其间发生了两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件是 1780 年 6 月马丽亚·特蕾西亚的小儿子马克斯·弗兰茨成为神父助理，就是说，被选为科隆选帝侯及闵斯特主教的继承人。另一件是这位继承人在最关键的时刻阻止了巴伐利亚交换奥属尼德兰。巴伐利亚与奥属尼德兰在收入上相差很大，如果交换成功，奥地利将失去理想的财源，势力将遭到削弱。虽然如此，因为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站在奥地利一边，而法国的态度又一直不明朗，所以给普鲁士带来极大的不安，因此，普鲁士开始考虑那些几年来牵扯到帝国的计